

[文章编号] 1002-5685(2010)11-0118-09

# “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应该改

——与李贵升教授商榷<sup>1</sup>

□ 赵心树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 香港)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英译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名不符实, 而且是自我污名和妖魔化。这个错误的译名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集体心理和对外关系造成巨大损害。这个英译应该正名。李贵升教授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不能改”, 其论证、论据、论点、思维逻辑、所据信息和政策主张都不能成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英译; 自我污名; 中外关系

##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Incorrect and Vilifying Indicator: In Response to Professor Li Guisheng

ZHAO Xinsh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incorrect, or rather, Self-imputable and Self-demonized. The incorrect translation has done harm to the national image, collective mind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Gongchan Dong" and Chinese government. Thus it should be rectified. Professor Li Guisheng's argument, logic and proposition are untenable.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Self-demonization, Sino-west 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4 和 2006 年, 我和李聪<sup>2</sup>在《国际新闻界》发表两篇文章<sup>3</sup>提出, 把“中国共产党”英译为“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是错误的, 应该正名。2010 年, 李贵升教授在《国际新闻界》发文, 批评我的意见, 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不能改”。<sup>4</sup>

我感谢李教授对我的工作的关注。他、我、李聪和《国际新闻界》显然都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很重要。我的文章发表以来, 未曾引起许多政策讨论, 更不用说政策措施, 想来赞成我的意见的是少数。李教授

的文章(以下简称“李文”)说明了反对的理由, 给了我进一步讨论的机会。

但我不同意李文的论据、论证和结论。详述如下。

### 片面的论证

我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三个主要论点:

1. “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利益团体, 而更接近

[收稿日期] 2010-09-20

[作者简介] 赵心树(1955-), 男,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美国北卡大学传播学院荣休教授。

于一个政权机关。party 单指利益团体。把这个特定的“党”译为 party 名不符实。一个 party 拥有永久的执政权,被英语国家的人民认为是威权和反民主,所以这个 party 也是个污名。

2. “中国共产党”在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常用该词的中国党政外交官员口中是一个褒义或中性词,而 communist 在绝大多数西方受众耳中是个极贬的贬义词。所以,把这个特定的“共产”译为 communist 不仅名不符实,而且是自我污名和妖魔化。

3. 不能满足于“词字翻译”,又称“机械翻译”,即根据词典一词一字地从一种语言搬到另一种语言,就以为万事大吉。要追求“传通翻译”,又称“信息翻译”,即,要使受者脑中接受的意义尽可能接近传者意图表达的意义。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的中翻英,就是要使英语听话人脑中浮现的形象尽可能接近于汉语说话人所要表达的“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这个符号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不是一个佳译。有其他多种英语符号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应该从这些符号中选择一个。

李文忽略了以上第 1 和第 3 两个主要论点,把第 2 点作为我的唯一论点来批评。这个论证是片面的。

## 颠倒的论据

针对我的论点 2, 李文的首要反对论据是:“它(communist party)一般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一篇介绍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文章中。”(113 页)作者没有提供实证调查或个人经验的佐证,这是一个基于猜测的“断言”。<sup>5</sup>

实际情况与这个断言正相反。由于 communist 是一个贬义词,而永久执政的 party 又被认为是威权、反民主,所以,在英语为母语的环境中 communist party 绝少见于正面或中性报道,而大量见于批评甚至攻击。

2001 年,刘鉴强系统分析了美国《纽约时报》关于李文和案的报道后发现(20 页):“当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国这个与美国如此不同的国家时,受自己意识形态的禁锢,往往是先定框框,这个框框就是‘这个共产党国家’、‘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专制国家’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字眼。而这一类词汇最容易引起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反感。”<sup>6</sup>(注意刘鉴强讨论的是 communist party 和 communist 等英语符号,他按当时的惯例把它们转换成了“共产党”、“共产主义”等中文符

号。我和李聪 2004 和 2006 年的文章发表后,这种转换是否合适成为疑问,以下贾卉、范勇等的文章在讨论英文符号时就不再转换,从而减少了误会。)

2006 年,我和李聪分析了 2001-2004 年间美国的一场辩论:对华比较温和友好的民主党参议员、后来的总统候选人克里说中国不再存在一个“communist 政府”,而对华鹰派领袖、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赫尔姆斯则嘲笑克里荒唐:连中国政府都承认自己是 communist(应读为“恶棍”),为什么你这个美国人要为他们解脱?一向鼓吹对华强硬的《华盛顿时报》更借此强烈攻击克里。

2008 年,贾卉研究了 2003-2007 年间美国《新闻周刊》中的涉华词汇,发现 communist 和 communist China 高频率出现,且都是出现在负面报道的语境下。贾卉用三个例子展示这些负面运用。<sup>7</sup>

2009 年,范勇<sup>8</sup>研究了当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2 日期间美国《纽约时报》刊载的 70 篇与中国有关的报道,发现“《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频繁出现的 communist 一词大都是负面应用:‘将‘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政府官员’等中性词语偷换成让美国公众产生敌意的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authority, Communist system, the Communists,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Party officials, 甚至是带有轻蔑之意和贬义的 Communist Bosses 和 Communist Regime”(174 页)。在范勇所举的三个例子中,communist、Communist Party 等词被用来隐指“中国人入侵西藏”、“中共干涉文化”、“中国人与西方为敌”。<sup>9</sup>

可见,实证发现与李文的首要论据正相反:communist 和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等词主要出现在批评攻击中共、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语境中。这也符合常识常理:贬义词(这一点李文也承认)很少用于赞扬,除非是讽刺挖苦或刻意表示反叛的文字游戏。

李文所说的“介绍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文章”,可能指中共和中国政府各级宣传部门制作的对外宣传。但在西方,除了极少数记者、外交人员、研究人员外,很少有一般民众到中国的官方网站或中国使领馆去研读宣传材料。即使偶尔接触到,若其中把贬义词当褒义用,受众只会觉得作者对他们的语言习惯懵懂傲慢,此类材料不会有正面效果,而只会起反效果。

李文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114 页):“称呼一个美国人为 Communist, 他并不一定认为这是咒骂用语”。根据我在美国西部、中西部、东部、东南部六个州生活二十五年的经验以及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其他英语国

家访问的经历,communist 是强烈的咒骂用语。小孩子吵架,骂对方 bastard (杂种)、animal (畜生),觉得不够劲了可以骂 communist。美国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传授的一个基本常识是:各地法庭普遍承认没有事实根据而称人是 communist 是诽谤。<sup>10</sup> 中共和中国政府自称 communist,不仅是自己骂自己,更自毁道德和法律保护,为攻击者提供了常在的“事实根据”。就好比在中国,说某人伟大、光荣、正确,即便没有根据也不是诽谤,说人是汉奸、流氓、恶霸才可能是诽谤。但若某党自称“恶霸党”,那么别人骂他恶霸、流氓、混账、强盗、匪徒、二流子都可能不算诽谤,而再不需要其他事实根据了。

李文因为美国有 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 而认为 communist 不一定是咒骂用语。作者没有注意,CPUSA 党员在美国人口中仅占十万分之一左右,人数估计少于 3K 党,<sup>11</sup>1984 年以后 CPUSA 不再推出总统候选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被遗忘。<sup>12</sup> 由于中国人对这个与中共同名的组织的好奇,它在中国的影响恐怕远大于它在美国的影响。除了 CPUSA 和 3K 党,美国还有其他微小群体,如合法的法西斯组织和不合法的基地组织。因 CPUSA 的存在而认为 communist 不是咒骂用语,就等于因为 3K 党、法西斯组织、基地组织的存在而认为“3K 党员”“法西斯”“本拉登”不是咒骂用语,相当于因为有中国人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认为“流氓”不是咒骂用语,或因有中国网民自名“恶棍”而认为“恶棍”不是咒骂用语。

### 循环的思维

李文谈到(114页)“‘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专政’等西方人认为具有贬义的词语构成了我们的思想体系用语,一旦改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混乱。”

我从未说过“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西方有贬义。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中文符号的意义。我说的是英文符号 communism 和永久执政的 communist party 在英语世界是贬义词,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与“中国共产党”各指不同的概念,communism 与“共产主义”各指不同的概念,用它们互译是错误的。但李文以上这段话说明,作者习惯性地、不自觉地假设这两对中英文符号是两对同义词,在这个前提假设下,“它们不是同义词”的主张和论证自然就显得荒唐。这是循环逻辑的思维谬误。李文在许多关键点上显得没有明

白我们的思路 and 主张,部分源于这个循环谬误。

由于循环思维,李文误以为我们讨论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体系用语”(114页)。其实,我们讨论的仅仅是英语语词。

### 傲慢的政策

李文列出了五个主张,其中第一个是(113页):“communist party …一般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一篇介绍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文章中。西方读者虽然认为 communist 具有贬义,但通过阅读该文,可以了解共产党在中国的光辉形象。”李文(114页)又举 black 的词义变化为例,主张不断重复使用 communist 等词来“介绍…巨大成就”,从而改变这些词的词义,使其从贬义词转换成褒义词。

除了论据颠倒,更重要的是对受众感觉的麻木无知。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让我转换以上引文中的受众、语言和被宣传主体:

“‘恶霸’…一般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一篇介绍新美国在恶霸党的领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文章中。中国读者虽然认为‘恶霸’具有贬义,但通过阅读该文,可以了解恶霸党在美国的光辉形象。”

这样的思维、命名、语言和策略,不可能把贬义词转换成褒义词,而只能进一步妖魔化该词背后的政权、国家和人民,给该国人民带来更多有形和无形的伤害。

李文五主张中的第二个是(113页):“西方人对 communists 的看法是错误的,对这类错误观点就不应默认甚至附和”,“对(西方人的)错误的看法,不论多少人持有,也不应该同意。”注意:李文讨论的不是我们的语词“共产党”在我们心目中的意义,而是人家的语词 communists 在人家心目中的意义;当我们的理解不同于人家的理解时,李文认为是人家错了,而我们有必要、有权力、有能力去纠正人家的“错误”!

如果美国政府网站或美国之音用中文反复发出“介绍新美国在流氓党的领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文章”,并称“中国人对‘流氓’的看法是错误的,对这类错误观点就不应默认甚至附和。对中国人的错误的看法,不论多少人持有,也不应该同意。”中国的受众会如何反应?认真学习,接受教育,感受美国流氓的光辉形象、承认流氓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还是痛斥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霸道蛮横?或是讥笑其对中文语言和习惯的无知、鄙视其对中华文化和人民的傲慢?

退一步想,即使真的能改变西方受众对 communist 和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这些词的认识,把这些词变成褒义词,有何价值?多年来对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人民”、“总书记”、“国家主席”、“政治局”、“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等一系列关键术语的误译,<sup>13</sup>已经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外关系造成了巨大困扰,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的有形和无形的伤害,继续付出这些巨额成本以换取几个外语符号在外国人心目中意义的改变,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在讨论“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等中文符号或这些符号所指称的实际对象,而只是谈英文符号。这是人家语言中的符号,人家土地上的受众,人家头脑中的意义。当我们中国人选用的外语词在外国人脑中的意义背离了我们的原意时,我们不愿改用一个符合原意的外语词(这样的词多得很),却坚持要数亿外国人民改变外语的词义,还说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113页)。如果外国人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中华语言和中国人民,我一定说他是语言沙文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新牌帝国主义。

### 缺失的信息

李教授没有充分了解他自己心目中的 communist 与西方英语国家受众心目中的 communist 之间的巨大差别,没有充分感受到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的 Party 与“党”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 communist 与“共产”之间的巨大差别。

这不能怪罪于李教授。他显然是在中国大陆的英语教学中接受了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感情力量使他难以充分理解和感受这个符号在外国受众心目中完全不同的意义——学习“中国英语”越早,在中国内地从事英语教学或英汉翻译的时间越长,受这种感情的羁绊越重。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 2004 和 2006 年,由于当时的发表环境和印刷条件,我和李聪的那两篇文章中的一些关键数据和图表被“略”掉了,使读者们未能得到所有信息。现在我补上这些图表:

图 1 和图 2 就是我 2004 年文章<sup>14</sup>中被“略”的图 1 和图 2。两图数据来自 2004 年春对美国北卡州三角地区 139 名居民的电话调查。该调查的细节和两图的意义在 2004 年文中有更多交代,请读者参照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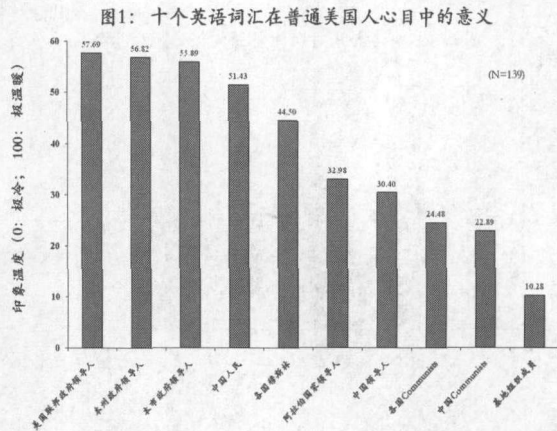


图2: Communist 对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领导人形象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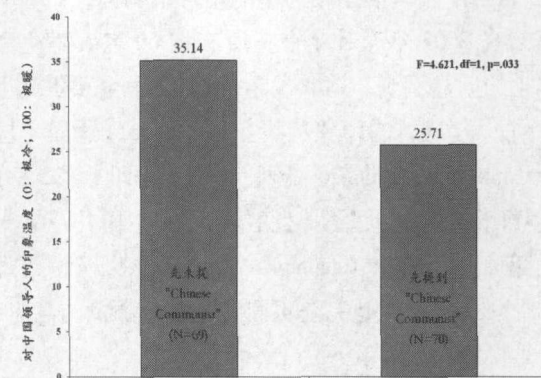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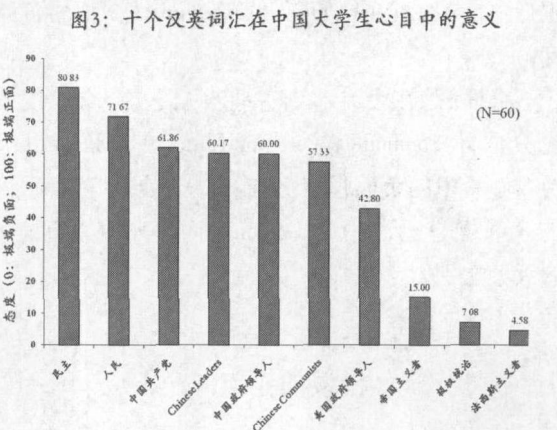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美国北卡居民对 Chinese Communists 的印象非常负面(23.89),在十种被测词组中仅高于“基地组织成员”(10.28);北卡居民对“中国人民”的印象相当正面(51.43),与民选产生的美国联邦、州和地方领导人相差不多;北卡居民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30.4)介于“中国人民”和 Chinese Communists 之间。图 2 显示,北卡居民对“中国领导人”印象不很正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 Chinese Communists 的拖累,一旦提到 Chinese Communists,受访者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猛跌近 10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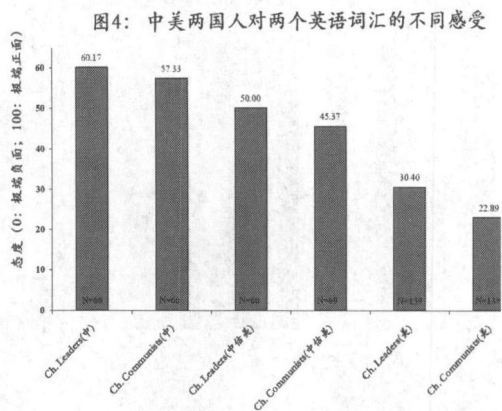


图3和图4本是为我和李聪2006年的文章<sup>15</sup>准备的,但由于当时的出版环境而不得不删去。图中的数据来自2005年春对北京三所高校6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问卷调查。图3显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相当正面(61.86),这同美国人对 Chinese Communists 的极为负面的印象(22.89)形成鲜明对照;这也说明,当中国人说“中国共产党”,把它翻译成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后,以英语为母语的受众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甚至褒贬颠倒的意思,是严重误译。

图3还显示,北京的受访者对 Chinese Communists 的印象也相当正面(57.33),与“中国共产党”(61.86)相距不远,这说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英文符号指称的是同一个概念;一般中国人,包括(或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可能难以了解英语国家人民心目中 Chinese Communists 的负面形象。

果然,图4显示,当我们要求北京的受访者估计美国人对 Chinese Communists 一词的印象时,受访者给了平均45.37,这比他们自己的印象57.33低了20%,说明受访者对美国人心中的负面印象有所感觉;但45.37的估计还是大大高于实际情况,相当于美国人实际观念(22.89)的近200%。这说明,中国人严重低估美国人心目中 Chinese Communists 一词的负面程度。

不难理解,在没有看到这些数据之前,李教授未能充分估计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在英语为母语的受众心目中的负面程度,未能充分估计这种负面感受与李教授自己心中的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之间的天壤之别。

### 错误的论点

李文五主张中的第三个是(113页):“容易引起

误解的译文不应一概否定”。坚守引起误解的译文,就违背了所有主流翻译理论中最基本的一条,“信”,也就是“准确反映原意”的原则。这不是翻译,也不是宣传,而是不管受众、不求效果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

李文五主张中的第四个是区分两种贬义词(113-114页),即公认的贬义词和有少数人认为是褒义的贬义词。由于英语国家有 communist parties, 作者认为 communist 不是公认的贬义词,主张可以用这类“非公认贬义词”翻译褒义词。这一主张的逻辑混乱。用褒义词翻译褒义词,中性词翻译中性词,贬义词翻译贬义词,准确传递说话人原意,是所有主流翻译理论的基本要求,即“信”。褒贬只能是以多数人而非全体人的观念为准。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都有千百万人使用,其中总有少数人的观念与众不同;在美英加澳新等主要英语国家,由于言论自由、观念多元,这个“少数”的人数往往不少。如图1所示,911之后不久的美国,连基地组织成员的得分也不是零。如果必须百分百公认方能定褒贬,那就没有褒贬了。“中国共产党”在多数中国人嘴里是一个褒义或中性词,而 Communist Party 在绝大多数英语国家人民的耳中是一个贬义词。上文提到,communist parties 成员在英语国家占人口的极少数,例如在美国约占人口十万分之一;不能因为这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人的意见而妄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不应继续沿用自我咒骂、自我污名、自我妖魔化的旧译。

李文提出(114页),“中国共产党”的英文名应与美英加澳等国的 Communist Parties 相同。作者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与那些组织之间的天差地别:中共是中国的唯一大党,唯一入宪的党,唯一的执政党,一个已经执政六十多年并追求永久执政的党,是一个渗透和驾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庞大组织;而美、英、加、澳这些所谓的“党”,是一些从未执政也没有执政希望,对社会政治经济毫无影响的微小群体。

另一个极重要的区别是:自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中共党章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继续革命”、“人民公社”、“计划经济”等一系列关键概念被“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代替,“中国共产党”这个词中的“共产”的实际意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套用一句宣传术语,就是“与时俱进”了;而同一时期美英加澳等国的 Communist Parties 从理论到实践都原地踏步,继续在政经社会生活中无声无息,它们的党名与党纲中的 communist 的意义,与中共党名与党纲中的“共产”的意义已

经相距十万八千里。中共没有理由跟随这些群体而自称 Communist Party, 除非中共希望真的向这些“党”看齐, 自我污名而变成毫无影响的微小群体。

李文五主张中的最后一个是(114页):“一个党的名称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指称符号, 它还表明自己的信仰及追求目标……中共党章写道:‘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目标当然应该体现在自己的中、英文名称上。而且这一目标是世人皆知的, 中共不应、也不必因为西方人的偏见就隐瞒自己目标和追求。”作者不明白: 英语国家普通民众心目中的 communism, 不是今日中共党章所说的、中共党员和普通中国人理解的“共产主义”, 而是斯大林清党时期或电影《日瓦戈医生》中的苏联, 是电影《杀人场》中的红色高棉, 是枪杀越墙平民的东德柏林, 是三年饥荒人相食、文化革命自残杀、对内残酷打击斗争、对外输出暴力革命的中国, 是王位世袭、饿死人也要造原子弹的朝鲜。Communist Party 这个符号, 只能表明这些野蛮的“信仰及追求目标”, 表明中共和国要往后退。我不希望也不相信这些是今日中共和国政府的“信仰及追求目标”。

李文说(114页), 正名“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起到一定作用。但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不会因改名而消除,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赵心树建议的新名)不久也会成为他们眼中的贬义词。”

纠正一个名字当然不会消除英语国家人民的所有偏见。但这是中国政治架构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 更正这个自我咒骂、自我污名、自我妖魔化的名字, 将有助于大为减少偏见, 显著改善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海外形象。同样重要的是, 还有一系列其他政治词汇, 如“总书记”、“国家主席”、“政治局”、“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人民”, 等等, 它们的英文译名都需要更正。而这些更正应当是整个国家公关和对外宣传的策略重建和组织重组的一部分。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把偏见降到最低的可能, 从而改善中国形象、促进中外了解、改进中外关系。这是相对最低成本, 最高效率, 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巨大实惠的“面子工程”。

李文断言改名只能有短暂的作用, 新名不久就会变成贬义词。作者显然不了解: 旧名成为贬义, 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有过的、在个别国家继续存在的、违背共产主义本意的残暴、野蛮和愚昧。自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之后, 这段历史在中国已经永远翻过去了, 至少我希望也相信是这样。虽然今日的中共和国还有许多不如人意, 明日的中

共和国也不会十全十美, 但两者同改革开放以前有天壤之别, 已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公允之士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不会说“中国不再存在一个 communist 政府”。我们希望也相信中共还将继续领导中国向前走, 走向平等、法治、民主和自由。英文正名, 宣示着对前天的野蛮愚昧的反思和决裂, 对昨天的改革开放的确认和信心, 以及对明天的民主自由的追求和决心。正名预示着继续进步, 有助于继续进步, 而进步又保证着更正后的名字维持中性、获得褒义。

设想, 一个成长于恶劣环境的孤儿, 年少时做尽坏事, 人人叫他“流氓”, 他也自称“流氓”, 甚至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在成长中, 他改邪归正, 进步惊人, 虽远非圣人, 甚至时不时故态复萌, 却日复一日继续努力向善。此时, “流氓”之名促成的本人心理和他人预期, 阻碍他继续成长, 拉动他倒退复旧。为少年计, 为亲友计, 为邻居计, 为社会计, 正名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个人如此, 团体如此, 政党亦如此。

## 沉重的代价

在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学者中, 王辑思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权威之一。<sup>16</sup>2010年夏, 王辑思总结中美关系说:“中美之间有对立也有潜在的冲突。但在经济上是谁都离不开谁, 经贸上的关系比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在政治上又很难达到互信, 中国人老是说美国人要西化, 遏制中国。美国人也会说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强大起来, 对美国有很大的挑战。”<sup>17</sup>

如上所述, 美国人并不怕“一个共产党的中国”,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 他们怕“一个 communist 的中国”, 因为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 communist 意味着饿死斗死国人, 输出暴力革命, 武力“解放”人类。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冤案。这个“communist 的中国”早已消亡, 我希望也相信是无可逆转地消亡, 中国人嘴里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已经与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受众耳中的 communist 和 communism 相距十万八千里。

可见, 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对手甚至潜在敌人的最大原因, 即“中国是 Communist Party 掌权”, 主要是一个符号误会。

同时, 中国视美国为遏制威胁甚至潜在敌人的最大原因, 即“美国人要西化中国”, 是另一个符号误会。“西化”者, 平等、法治、民主、自由也。这些价值观念从来就不专属于哪个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或文明, 而

是包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内的全人类各主要民族和文明的共同追求。<sup>18</sup>既然是共同追求,西方人大可不必高举“西方价值”的大旗压迫中国人接受,中国人更不应该高举“西方价值”的盾牌躲避或拒绝。

由此说来,中美之间对立、冲突甚至敌对的两大根源 Communist Party 与西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观念错位与符号误会。

假想,民国年间,有不懂粤语的北方人到广东,与不懂国语的当地人合作,双方在商务、财务等各方面利益互补,相互依靠,本应是互利的伙伴甚至朋友,但却为两件事而龃龉频生,甚至可能大打一场:

1) 广东人说北方人生活习惯不好,抽烟喝酒纵欲,有害健康,而健康养生是广东传统,你必须改变习惯,不然我就说你骂你罚你。北方人说我的身体关你屁事,既然健康养生是你广东传统,那损害健康就是我北方传统了,所以我必须损害自己的健康!

2) 北方人名“康道”,粤语以 H 音起首,但北方人坚持北方发音,以 K 音起头,在粤语中被听成了“强盗”。北方人说:名字发音乃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即便说粤语时也不能改;你们必须明白,我是和平崛起、韬光养晦的强盗;我手里的刀枪手雷炸药只为自卫,虽然我不会忘记你们曾经欺压迫迫我,我不高兴,我可以说不;你们认为强盗抢东西,那是错误的,不论多少人持有这种偏见,我也不应该同意、默认甚至附和。我如果改变强盗的名字,就是默认附和了你们。我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建立强盗乐园,这一目标当然应该体现在我的名字的国语、粤语发音上。而且这一目标是世人皆知的,我不应、也不必因为你们广东人的偏见就隐瞒自己的目标和追求。

广东人越听越糊涂,越想越害怕,寝食不安,于是花钱购置短刀长剑火枪大炮,扩充本已可观的卫队。北方人见了,既恼火又紧张:我忍着性子跟你反复解释我康道绝无恶意,你就是听不进,可见你意识形态作祟,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加倍扩充武力。

与此同时,两人在商务财贸上的合作还不得不继续,因为“在经济上谁都离不开谁”(借王缉思语)。<sup>19</sup>

美国是世界最强国,还有英加澳新印巴等国十亿人民以英语为唯一语言或主要官方语言。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主要军事强国之一。中国与英语世界之间的符号误会,受损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更是中国和英语世界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减少这种误会,消弭不必要的冲突甚至敌对,是各国学界和政界的责任,特别是中国传播、翻译、外交学界和政界的责任。

## “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应当纠正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应予纠正。

要纠正,可供选择的褒义或中性符号多得很。我曾经建议的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CCL),是其中之一;我仍然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它的最大优点是准确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从中央到最基层的领导人的组织。其次,由于 leaders 和 council 都是褒义或中性词,CCL 在褒贬上也极为接近“中国共产党”。CCL 的另一个优点是不含意识形态意义,于是不会挑动或刺激西方受众的意识形态神经。CCL 的第三个优点是远离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由于 CPC 名不符实且是污名,远离是好事。但这个优点也是 CCL 的最大缺点:熟悉中式英文、对 communist party 这个英文符号有感情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共党员难以接受任何不同于 CPC 的符号,更不用说远离 CPC。

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国民党的做法,即,避用或少用 Nationalist Party (略带贬义,但其贬义比 Communist Party 温和多了),而使用音译 Kuo Ming Tang,简称 KMT。延用到中共的英文名,就是 Gong Chan Dang,简称 GCD。虽然 GCD 像 KMT 一样可能使初见者不知所云,但起码避开了自我污名的 communist 和名不符实的 party。

在英语中,从全名引申出缩写名,再把缩写名用作正式名称,是一个常用而有效的公关手段。例如,英国石油公司原名 British Petroleum,缩写 BP,成为跨国公司后,为了淡化地域、国别色彩,于 1998 年趁合并重组之机废弃 British Petroleum,代之以旧缩写 BP,以至今日各国年轻一代往往不知道该公司源自英国。2010 年夏,英油在美国墨西哥湾的油井爆炸漏油,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为了强调漏油者是外国公司,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公开演讲中使用该公司旧名 British Petroleum。美国媒体一方面抨击 BP 渎职造成漏油,另一方面也指出使用该公司已正式废弃的旧名不公平,不绅士,不可取。中国人熟知的例子还有汇丰银行,原名 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虽然这个全名未被完全废除,但旧缩写 HSBC 早已成为主要的正式名称。考虑这些成功的例子,中共也可以宣布 CCP 或 CPC 为正式名称。

废弃旧名和启用新名未必同时,而可以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差,以减少震动。例如,可以宣布,鉴于研究显示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造成诸多误解和困

扰,赋予“中国共产党”第二英译,如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原名和新名都是正式名称,由使用者视情况选用。同时鼓励翻译、学者、外交人员和其他人等在实际工作中尽量使用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及其缩写 CCL。当新名及其缩写已被广泛接受时,旧名的影响自然就减少,若继续保留,其伤害有限;若宣布废弃,其震动也小。

在个人操作层面,一些朋友羞羞答答地告诉我,在看到我们 2004 年以来的文章后,<sup>20</sup>他们在各自的英文名片上“做了手脚”。例如“中共市委宣传部长”译为“Director, Information Office, City Government”,“校党委书记”译为“Chairman, University Board of Governors”。这些都比词典里提供的标准译法好得多,不必羞羞答答,自觉惭愧,而且应该推广。

在中央政策层面,更应该正名。正名的收益巨大,正名在技术上不难,经济上的成本相对很小。但正名恐怕难以实现。障碍在中国,在党内,在党员和决策者心理。虽然他们都是中国人,但他们对 communism、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这些英文词已经有了感情,像李教授一样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正名。于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恐怕还要继续为了几个英文词而背大债、付大钱、吃大亏。我的这一系列研究,我对李教授的这些争论,除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再试一次外,也是为了给后人一个记录和警示:几个熟知的外语符号的滥用和误用,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要纠正它们,看上去多么简单,做起来多么困难。

最叫我揪心和感叹的是:最大的障碍,不是处心积虑咒骂我们的外国人,而是懵懵懂懂咒骂自己的中国人。恶名在外,乃因孽障在心。

再次感谢李贵升教授和《国际新闻界》给我又一次机会,更给中国的海外形象和国际地位又一次机会。

#### 注释:

- 1 本文初稿曾送李贵升教授征求意见,李教授的反馈有益于本文的修订,谨此致谢。作者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和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王宁、何俊涛、赵心砚对本文初稿的反馈和其他帮助。当然,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可能的错误负有全责。
- 2 李聪当时是美国北卡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美国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 3 赵心树:《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翻译与词字翻译——以“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为例》,《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Zhao, Xinshu, “The Communicative Effects of Word-Character Translation vs.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4, no.4. (in Chinese)] 赵心树、李聪:《跨语传播中的应用符号学理论——再谈“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Zhao, Xinshu; Li, Cong, “Applied Semiotic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6, no.8. (in Chinese)]

- 4 李贵升:《“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不能改——与赵心树教授商榷》,《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Li, Guisheng, “Rethinking the English version of ‘中国共产党’”,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0, no.4. (in Chinese)]
- 5 关于“断言论证”,参见赵心树:《怎样算够民主并回复方绍伟——答方绍伟并谈“草人谬误”与“断言论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chinaelections.net/NewsInfo.asp?NewsID=183770>, 2010-8-3。[Zhao, Xinshu, “What is Full Democracy □ In Response to Fang Shaowei”, *China Elections*, <http://chinaelections.net/NewsInfo.asp?NewsID=183770>, 2010-8-3. (in Chinese)]
- 6 刘鉴强:《从李文和案看〈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性》,《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Liu, Jianqiang, “A Look into the Ideology of New York Times through the Case of Li Wen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1, no. 1. (in Chinese)] 转引自范勇:《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词汇与“中国形象”塑造——基于对〈纽约时报〉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Fan, Yong, “The Ideological Prejudice in Reports of China among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U.S.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New York Times”,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09, no.8. (in Chinese)]
- 7 贾卉:《意识形态与美国〈新闻周刊〉涉华词语的翻译》,《上海翻译》,2008年,第2期。[Jia, Hui,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of Words Concerning China in Newsweek”,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8, no.2. (in Chinese)]
- 8/9 范勇:《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词汇与“中国形象”塑造——基于对〈纽约时报〉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Fan, Yong, “The Ideological Prejudice in Reports of China among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U.S.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New York Times”,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09, no.8. (in Chinese)]
- 10 “With the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character, aims, and methods of communism, almost all courts have come to regard such an accusation (referring to a person as being a communist) as being clearly defamatory.” 见 *Solosko v. Paxton*, (Pa. 1956) 119 A. (2d) 第 230 页。又见 *Michigan Law Review*, vol.55, 第 146 页。
- 11 Matt Corley, “KKK has ‘reversed declining membership’ in recent years.”, *Thinkprogress.org*, <http://thinkprogress.org/2010/04/12/kkk-membership-hate/>, 2010-10-1.
- 12 “Communist Party USA,”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



- wiki/Communist\_Party\_USA, 2010-10-1.
- 13 参见赵心树、李聪:《应用符号学在英译“人民”时的应用》,罗以澄、秦志希、夏倩芳、王瀚东(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83-89页。[Zhao, Xinshu, Li, Cong, “Applied Semiotic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nmin”, in Luo, Yicheng, Qin, Zhixi, Xia, Qianfang & Wang, Handong (e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Wuhan Press, 2006, pp.83-89. (in Chinese)]
- 14 赵心树:《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翻译与词字翻译-以“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为例》,《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Zhao, Xinshu, “The Communicative Effects of Word-Character Translation vs.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4, no.4. (in Chinese)]
- 15 赵心树、李聪:《跨语传播中的应用符号学理论——再谈“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Zhao, Xinshu & Li, Cong, “Applied Semiotic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6, no.8. (in Chinese)]
- 16 王辑思,199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 17/18 纪硕鸣:《专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警惕中美海上碰撞危机》,《亚洲周刊》,2010年,第28期。[Ji, Shuoming, “An Interview with Wang, Jisi,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Asia Week*, 2010, no.28. (in Chinese)]
- 19 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推理,见赵心树:《选举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增订版,第1章第3节,第2章第5节,第3章第1节,第6节2009年网上版见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112>, [Zhao, Xinshu, Dilemma in Elections, Sichuan People Press, 2008, Section 3 in Chapter 1, Section 5 in Chapter 2, Section 1 and Section 6 in Chapter 3, see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112> for the 2009 version of this book, 2010-8-3. (in Chinese)]; 及赵心树:《自由与稳定必须兼得》,《全球传媒学刊》,2010年,第6期,网上版见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3445>。[Zhao, Xinshu, “Freedom and Stability are both Needed”, *Global Media Journal*, 2010, no.6,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3445>, 2010-8-3. (in Chinese)]
- 20 赵心树:《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翻译与词字翻译-以“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为例》,《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Zhao, Xinshu, “The Communicative Effects of Word-Character Translation vs.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4, no.4. (in Chinese)] 赵心树、李聪:《跨语传播中的应用符号学理论——再谈“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Zhao, Xinshu; Li, Cong, “Applied Semiotic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06, no.8. (in Chinese)] 赵心树、李聪:《应用符号学在英译“人民”时的应用》,罗以澄、秦志希、夏倩芳、王瀚东(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年,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83-89页。[Zhao, Xinshu & Li, Cong, “Applied Semiotic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nmin”, in Luo, Yicheng, Qin, Zhixi, Xia, Qianfang & Wang, Handong (e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Wuhan Press, 2006, pp.83-89. (in Chinese)] 赵心树:《细释冠名的十加一原则》,罗以澄、秦志希、夏倩芳、王瀚东(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49-56页。[Zhao, Xinshu, “A Guideline for Concept Explication and Concept Naming”, in Luo, Yicheng, Qin, Zhixi, Xia, Qianfang & Wang, Handong (e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Wuhan Press, 2005, pp.49-56. (in Chinese)]

(上接第117页)

判的精神和全球的视野,为新闻传播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和方向。正如IAMCR主席安娜贝拉·斯瑞贝妮(Annabelle Sreberny)在开幕式中讲到,随着便利公众参与的平台在不断扩大,“博客”和“微博”一代促生了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公民参与的本质与程度,政治进程与传播表达的关系,受到了全球研究者的关注。传播技术的变迁给媒介本身,媒体从业者以及受众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和挑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的问题正在出现。在一个充满了经济、文化以及道德危机的时代,我们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体制正面关键转型,我们亟需新的批判范式,新的判断标准,以及新的伦理道德来应对危机和迎接挑战。

注释:

- 1 数据来源:IAMCR2010组委会。  
2 项目网址:<http://www2.lse.ac.uk/media@lse/research/EUKidsOnline/Home.aspx>, 2010-11-15。